

民主与信任

DEMOCRACY & TRUST

[美] 马克·E. 沃伦 编
吴 辉 译



华夏出版社

民主与信任

DEMOCRACY & TRUST

THE CHI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民主与信任

Democracy & Trust

[美] 马克·E. 沃伦 Mark E. Warren ● 编

吴 辉 ● 译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与信任/(美)沃伦编;吴辉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0

ISBN 7-5080-3600-X

I. 民… II. ①沃… ②吴… III. ①民主-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②理解社会学-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D082-53 ②C912.6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8668 号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ntitled
DEMOCRACY & TRUST by WARREN, MARK 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HUA XIA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 2004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2-4601 号

责任编辑:郑镛成

装帧设计:阿 东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人卫印刷厂

版 次:2004年10月北京第1版

200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670×970 1/16

印 张:21.5

字 数:340千字

定 价:38.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撰稿人

琼·科恩 (Jean Kehen),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

罗素·哈丁 (Russell Hurdin), 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

罗姆·阿尔 (Rom Harre), 牛津大学和乔治敦大学心理学和哲学教授。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Ronald Inglehart), 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

简·曼斯布里奇 (Jane Mansbridge),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

克劳斯·奥弗 (Claus offe), 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

奥兰多·帕特森 (Orlando Patterson), 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

詹姆斯·C. 斯科特 (James C. Scott), 耶鲁大学政治学和地质学教授。

埃里克·M. 乌斯拉纳 (Eric M. Uslaner), 马里兰大学政治学教授。

马克·E. 沃伦 (Mark E. Warren), 乔治敦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致 谢

本书源于乔治敦大学关于加强政治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特别是强化其跨学科属性的一项倡议。这项倡议由布鲁斯·道格拉斯（Bruce Douglass）设想和提出，并得到安德鲁·梅隆基金会（Andrew Mellon Foundation）的慷慨资助。作为该项倡议的一部分，杰拉尔德·马拉（Gerald Mara）和我召集了乔治敦大学教授会的一个小型团体来讨论一些既被广泛意识到又尚未获致解决的民主问题，这些问题将引起范围广泛的兴趣和方法论探讨。我对萨姆·巴恩斯（Sam Barnes）、戴维·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罗姆·阿尔（Rom Harre）、格里·马拉（Gerry Mara）、欧塞维奥·穆哈尔－利昂（Eusebio Mujal－Leon）、戴安娜·欧文（Diana Owen）关于什么是民主问题以及什么不是民主问题的出色想法和可靠直觉表示感激。我们最终将问题集中在民主与信任之间难以捉摸的关系上，并且同意继教授会之后组织一次关于这一主题的会议。在1995－1996学年里，我召集了一次探索性的讨论会，汤姆·班肖费（Tom Banchoff）、萨姆·巴恩斯（Sam Barnes）、阿利沙·卡斯（Alisa Carse）、戴维·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罗姆·阿尔（Rom Harre）、丹尼尔·麦卡利斯特（Daniel McAllister）、格里·马拉（Gerry Mara）、乔舒亚·米切尔（Joshua Mitchell）、欧塞维奥·穆哈尔－利昂（Eusebio Mujal－Leon）、戴安娜·欧文（Diana Owen）、彼得·法伊弗（Peter Pfeiffer）、特里·平卡德（Terry Pinkard）、丹尼斯·奎因（Dennis Quinn）、亨利·里查森（Henry Richardson）、阿维尔·罗斯沃德（Aviel Roshwald）、马克·图斯内（Mark Tushnet）、蒂姆·威克姆－

克罗利 (Tim Wickham - Crowley)、迪亚那·耶格尔 (Diane Yeager) 参加了该讨论会。如果没有这些讨论会参加者的讨论、争论、指导及独特的多学科的贡献，我对民主与信任问题的理解将比它本身要肤浅得多。在我们于 1996 年 11 月于乔治敦召集的一次名为“民主与信任”的为期三天的小型会议上，讨论会的参加者也对格里·马拉和我提供了指导。被邀请的演讲者事先提供了他们论文的副本，这些副本依次可以为听众得到。听众通过提供富有创见的和挑战性的参与交换了思想。这本书包括了这些论文的修订稿，其中许多论文自那次会议后有了很大改进，并且在许多方面是针对那次出色讨论做出的反应。珍妮弗·克斯莱克 (Jennifer Kerslake) 再次以极大的耐心编辑了初稿。马克·米切尔 (Mark Mitchell) 勤奋、快速地编制了索引。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约翰·哈斯拉姆 (John Haslam) 以极好的建议、好脾气、韧性和耐力从头至尾地阅读了书稿。

马克·E. 沃伦

1998 年 10 月于华盛顿

目 录

图表索引

撰稿人名单

致谢

序言·····	马克·E. 沃伦	1
我们要信任政府吗? ·····	罗素·哈丁	20
我们怎样才能信任我们的同胞? ·····	克劳斯·奥弗	39
信任、幸福与民主 ·····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81
民主与社会资本 ·····	埃里克·M. 乌斯拉纳	112
自由反对民主国家:		
论美国人不信任的历史根源和当代根源 ·····	奥兰多·帕特森	141
信任、自愿社团与有效民主:		
当代美国的市民社会话语 ·····	琼·科恩	194
信任及其替代物: 政治过程的心理基础 ·····	罗姆·阿尔	231
信任地理学与等级地理学·····	詹姆斯·C. 斯科特	254
利他信任 ·····	简·曼斯布里奇	270
民主理论与信任·····	马克·E. 沃伦	289
结论·····	马克·E. 沃伦	322
译后记 ·····		335

图表索引

I、图

- 3.1 制度体现的信任生成价值 69
- 4.1 按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及宗教传统计算的
 人际信任 86
- 4.2 从长远观点看对他人的信任：美国公众之间的人际
 信任，1960 - 1995 年 89
- 4.3 人际信任与民主 96
- 4.4 主观幸福与民主 100
- 4.5 文化差异相对持久，但并非不可改变：总体生活满
 意度的跨国差别，1973 - 1995 年 107
- 4.6 亲民主的政治文化、认知动员与稳定民主：零阶
 相关 109
- 5.1 从长远观点看对他人的信任 124
- 6.1 按年计算的信任者的百分比 161
- 6.2 信任政府行政部门的趋势 162
- 6.3 信任国会的趋势 162
- 6.4 按教育程度计算的情感信任的趋势 163
- 6.5 按性别计算的情感信任的趋势 164

6.6	按宗教计算的情感信任的趋势	164
6.7	按种族计算的情感信任的趋势	165
6.8	按地区计算的情感信任的趋势	165
6.9A	按同期出生群计算的情感信任者的百分比	172
6.9B	按同期出生群计算的信任者的百分比	173
6.10	美国民主制度中的信任与精英控制模型	177
6.11	按 16 岁时的父母收入及期间计算的信任者的百分比	177
6.12	按总的家庭收入及期间计算的信任者的百分比	178
6.13	按看电视的时间计算的信任趋势	182
6.14A - F	按年份和政见计算的信任者的百分比	187

II、表

4.1	教育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低收入社会与先进工业社会	84
4.2	经济发展、民主水平（1972 - 1997 年）及文化遗产 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88
4.3	文化价值观与民主：复回归模型	103
4.4	民主的稳定性：复回归模型	105
6.1	非南方的投票率时期，1840 - 1980 年	158
6.2	南方的投票率时期，1840 - 1980 年	159

序 言

马克·E. 沃伦

关于民主与信任的关系，是可以提出一些重要问题的，这一点直到最近才逐渐凸显出来。考察历史，我们就能理解自由主义进而自由民主为什么能从对传统政治权威及教士权威的不信任中产生出来。自由主义改革旨在限制信任关系中所蕴涵的自由决定权（the discretionary powers, Dunn 1988; Ely 1980）。民主的成分越多，就意味着对权威的监督越多，信任越少。当我们从一个更一般的视角来考虑信任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时，这一论题似乎不再是浅显的。政治因利益冲突和认同冲突而与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不同，所以仅仅是社会关系转变为政治关系的事实就足以使信任的特殊条件成为问题。信任包含一种判断，不管是多么隐含的判断，即由于授予他人对某些利益问题的自由决定权，也接受了他们潜在不良意愿所造成的易受伤害性。一旦赋予信任，人们就要承担潜在伤害所带来的一定量的风险，以换取相互合作的好处。正如安妮特·贝尔（Annette Baier, 1986: 235）指出的，“一个人如果相信他人的良好意愿，他就必然容易受到他人良好意愿有限性的伤害。当一个人信任别人时，他就给别人留下一个伤害他自己的机会，这也显示出他的信心，即被信任的人不会利用这种机会”。所以，如果我给别人以信任，我也在考虑——无论是习惯地还是默认地——我的信任将不会被滥用。而且这意味着在我本人和被寄予信任的人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利益冲突，或者至少没有其他关系、保证或保护也无法调和的利益冲突。

然而，就政治而言，假设与他人有紧密关系却经常令人可疑，而

且这里包含了民主与信任论题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的性质。使一种关系成为政治关系的情况是，集体行为的某一争端或问题或紧迫事情遇到了利益冲突或身份冲突，而且当事各方将他们的资源运用于这些冲突（Warren 1999）。一项重要的民主创新就是承认在许多关系中信任被弄错了或是不适宜的，在维持剥削和家长式的关系的同时，信任掩盖了真实的利益冲突（Barber 1983: 93）。在任何现存的信任关系中，民主机制，诸如投票、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分权等，使人们能够质疑那些假定的信任关系，同时限制被信任者的自由决定权及其潜在的危害。

然而，民主制度在欠充分信任不存在的情况下需要这些机制帮助产生一种体面的政治生活的事实，并不表示没有信任民主制度也能运行。即使在一些几乎微不足道的方面，如果没有信任，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活动也将变得无法进行。为什么我们并不期望这一事实与我们管理我们自己的手段之间的一些基本关系呢？举例来说，如克劳斯·奥弗（Claus Offe）在本书第3章中指出的，当其他手段——尤其是国家通过惩罚性规则进行管理以及市场的无意识的协调——完成必要的和适宜的社会工作受其能力限制时，信任就能充当令人满意的社会协调手段。一个能够促进牢固信任关系的社会，也很可能是这样一个社会，它能够给予更少的管理和更多的自由，能够应付更多的意外事件，激发其公民的活力和创造性，限制以规则为基础的协调手段的低效率，并提供更强的生存安全感和满足感。确切地讲，民主的管理方式怎样同这些优点相适应呢？

然而有这么一部关于信任的重要著作，它除了少数情形外，不是针对民主政治与信任——不管是对于政治权威的信任，还是对于作为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或文化变迁的间接后果而在社会内部产生（或被削弱）的信任——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本书所收集的论文旨在解释民主与信任之间复杂关系中所涉及的问题。这些论文是跨学科的，并且许多论文是将理论与经验发现相结合的。这种兼收并蓄的混合是有意的，因为要解释“民主与信任”这一论题所涉及的问题和疑问，至少应包含来自哲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贡献。除此之外，这一论题也还需要得到读者的某种包涵。虽然论文的作者们曾力求相互交流，并协调他们跨领域的学科语言，但张力依然存在。这反映出作者们有多少不同的学科倾向和问题，那么他们对于

讨论中所涉及现象的概念化、解释和判断就有多少不同的意见。

下面，我就民主与信任这一论题在本书中的展开作一些初步的解释。这一论题被分成许多虽然关联密切但又各不相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规模问题、复杂性和相互依赖问题，它们常常对民主的决策方式形成限制，并对信任产生功能压力。这是我在第一部分概述的问题。在第二部分，我提出同个人信任相对的制度信任的问题，以及从民主的角度看，信任制度是否总是合理的问题。第三部分介绍了特殊信任与一般信任之间的重大区别。根据本书所作的讨论，一般信任有助于民主的适宜形式，而特殊信任——例如，限于对家庭或者种族或宗教集团成员的信任——则不然。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介绍关于“社会资本”的讨论，这一观念认为信任是公民社会指导和训练政府、组织和协调集体行动能力的关键要素。在第六部分，我对安全、风险与信任之间的重要关系作了评论，强调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人民通过信任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最后一部分介绍信任关系是否以及如何能够直接成为政治意义域中民主方式的组成部分。

相互依赖、复杂性与信任

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分化同时又更加相互依赖，个人越来越多地面临矛盾的情况。一方面，这些情况的发展能够，并且经常能够，扩大生活选择——因更高的效率、多元化及流动性而产生的选择。另一方面，在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减少个人可能注意其遭受伤害机会的同时，日益增加的相互依赖扩大了个人的易受伤害性（参见 Offe 1996：第1章）。确实，对于支配他们的制度和相互依赖，个人永远不可能有完全的把握，因为那将意味着他们本来就知道他们易受伤害性的所有情况。然而，今天，人们的认识能力与他们对影响其生活的偶发事件的了解和判断能力之间的鸿沟似乎不可逾越。

不过，个人确实可能跨越这道鸿沟。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不是通过弄清楚他们的易受伤害性，而是通过碰运气式地对他人、制度和体制寄予信任来跨越鸿沟。如卢曼（Luhmann, 1979）、吉登斯（Giddens, 1990）及其他一些人所强调的，给予信任，尤其是对那些嵌入制度的陌生人给予信任，使得跨越大的时空范围而行动协调成为可

能，这必然也使更加复杂、分化和多样化的社会的种种好处成为可能。同时，对个人来说，当信任允许他们对所依赖的多数关系想当然而给其提供一种安全感时，信任减少了复杂性。这些结果不仅有利于福利本身，而且使个人扩大他们的行动视域成为可能。在最基本的方面，事实就是这样。如果我不愿意相信我在大街上遇到的一些陌生人将不会抢劫我，那么我就只能呆在家里。所以，与信任相对置的，不是对风险和意外事件的透彻了解，在复杂的社会中尤其如此——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而是普遍的不信任，这虽然提供了一种安全感，但却是以贫乏的人类生存状态为代价的。

令民主人士不快的是，上面这些促成信任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的因素，同时也限制人们可能利用那些指导和训练其政治代表的政治资源来参与直接或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的范围。个人应对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享有发言权的强烈的民主期望只会扩大矛盾。和在别处一样，在政治事务中，由于我们的政治资源（例如时间和知识）与我们所处的广泛依存的复杂网络之间的不相称状况，我们也遭受着比我们通过政治参与可能影响的更多的易受伤害性。就大多数影响我们生活的决策来说，我们不可避免地处于某些或许于信任有利的环境中，因为信任——在该环境中信任是有保证的——将使我们分配自己稀缺政治资源的方式尽可能优化。对特殊制度、代表和权威的有保证的信任将使民主国家中的个人把他们的资源集中于那些重要问题——特别是那些他们有充分理由不信任的问题上（Warren, 1996）。因此，从严格意义的功能角度看，我们可以把信任和民主看作**集体决策和组织集体行动的既有区别又互相补充的方式**。当一个人信任时，他假定在信任者和被信任者之间存在共享的或共同的利益，从而**放弃**影响决策的机会。如果合理的信任在某些情况下能减轻个人和制度进行政治决策的负担，那么复杂社会中的民主决策可能变得更加稳健。

民主主义者应信任政治制度吗？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功能预期无疑落后于对研究的广泛关切。研究表明，在过去几十年间，在美国、以及较小程度上在西欧，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威的信任急剧下降（参见帕特森、英格尔哈特、乌斯拉纳，本书）。但这是否是一个问题——比方说，与一个日益复杂的公

民的标志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信任政治制度甚至信任政治代表是否总是可行。如果我们假定民主、信任与政治制度之间存在某种重要关系，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信任要求什么以及何时是适宜的。在第2章（“我们要相信政府吗？”），罗素·哈丁（Russell Hardin）对这样一个论点，即对政府信任的下降是有害的，持一种怀疑态度。的确，如果我们假定人们理智地思考和行动，那么，“我们不应该由于简单的原因而要一般地信任政府，这个原因就是，除了错误的推断之外，典型的公民与政府或绝大多数的政府官员之间可能没有适当的联系使我们能信任政府”（pp.23-24）。按照哈丁的观点，用认识论的话说，问题是是否任何个人总能知道为保证同政府信任关系所需要的一切——毕竟，在当代的大多数国家，政府是由成百上千的部门、办事处、下属机构及层级组成，由一些我们永远无法直接了解的人构成，而且这些人以一些我们永远无法通过直接经验进行判断的方式行事。

哈丁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信任这一特殊概念——亦即，信任作为“暗含的利益”（encapsulated interest）的一种表述（参见Hardin 1993），这是将理性选择原理扩大到信任关系的一种解释。根据这些原理，个人寻求（自私的）偏好的最大化，同时节省获取为了解行动方针所需信息的努力；在任何情况下，这将使偏好最大化。因此，“就某一事情而言，说我信任你，意味着关于该事情我有理由期望你为了我的利益行事，因为你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这些理由以我的利益为基础。”……你的利益暗含我的利益（P.26）。另外，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信任是矛盾的。一方面，信任关系在增加合作效用的同时减少了信息成本；另一方面，因为个人是自私的，那些信任别人的人似乎在非理性地选择增加他们受他人伤害的可能性。哈丁通过将信任概念化，认为信任“属于知识的认知范畴”，并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处理矛盾，所以只有当“我知道或者我认为我知道你的有关情况，尤其是你对我的动机”（P.24）时，信任和不信任才有意义。与奥弗、阿尔（Harre）和曼斯布里奇（Mansbridge）在本书中所阐述的概念相反，哈丁没有把道德内容归属于信任（与可信性相反）。相反地，当一个人这么做符合其利益时，他应该信任，而且由于知道被信任者的动机，他能够知道这一点。

关于信任的这一含义，哈丁认为，它丝毫不表明要信任政府。我们可能依赖政府。我们可能发现政府令人宽慰地可以预见。但我们不

应该信任政府：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相关的利益和情况，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信任或者不信任。因此，关于大规模复杂社会中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即使是民主政体都不能引起信任，我们也不应期望它引起信任。按照哈丁的解释，如果信任是一件好事，那么它应该在其基本的认知条件有机会存在的地方被寻求、认同、解释和鼓励——而这在个人与政府、甚或个人与其选举的代表之间的冷淡关系中通常并不多见。在这一意义上，对政治制度信任的下降不是一个问题。确实，它甚至可能是公民对于信任条件变得越来越老练的一个标志，这也是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本书和其他地方提出的一个论点（Inglehart 1997）。

相反，克劳斯·奥弗（第3章，“我们怎样才能信任我们的同胞？”）把西方和后共产主义东方对制度的“信任不足”视为民主政体的问题。他认为，在缺少非正式的社会协调方式的情况下，要解决当今社会所面临的大量集体行动问题，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困难的。由于大系统日益增加的相互依赖，国家越来越多地陷入解决一度由公民社会的自发组织去解决的问题。然而，今天在许多国家，政府变得太软弱以致不能贯彻和执行其政策，而必须越来越多地依赖公民的信任和合作（参见 Offe 1996）。在复杂的社会中，这一问题不能被认为（如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重新建立在直接交往关系基础上的信任问题。相反，与主要的社会协调问题相适合的各种信任不可避免地是制度信任，因为如奥弗指出的，诸如“我”和“别的每个人”之间的信任问题，对“别的每个人”不具有个人特征。

奥弗通过设想“信任制度”的可能含义，试图准确地找到一种感觉，在这种感觉中，各种制度可能肯定这种特殊的信任不足。他同意哈丁的意见，即信任制度与信任个人不是一回事，但他认为（正如阿尔和帕特森在本书中认为的那样），信任制度仍然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一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信任制度”意味着某种不同于“信任我的邻居”的东西：它意味着知道一种制度的“基本思想”或好处。如果这种思想对人们完全合理，它就会激发人们对制度的支持和对规则的顺从。根据奥弗的观点，信任某人的邻居，含有对互惠的预期。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定义信任，那么信任一项制度就如同信任某个人的自行车一样毫无意义，因为二者都不能交互作用。跟一辆自行车一样，制度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信任的对象，而只能是经验知识或理论知识

及信仰的对象。只有人，作为社会行为者，能够遵守包括互惠在内的规则，遵守规则是信任再现所必需的。因此，奥弗认为，“知道制度的全部含义和正当理由，使‘我’这个参与的观察者可以决定我如何将信任给予他人；这些人虽然是陌生人，但仍然是一个制度政体内的共同生活者，而且‘我’有理由期望他们的行为模式被制度所固有的明显含义所塑造和赋予特征”（P.71）。“信任一项制度”意味着知道其构成规则、价值及准则为参与者所共有，而且他们认为这些规则、价值、准则是有约束力的。

所以，与哈丁的观点相反——哈丁认为对制度缺乏信任是由于个人信息有限，奥弗的方法集中关注核心“文化和道德资源”的不足。制度能否被信任，取决于它们是否被形成结构，以致它们能够通过推理诉诸其构成规则。在那些没有持续地诉诸这些规则的地方，普遍信任的基础受到削弱。奥弗指出，最终只有两种策略能够解决对制度的信任不足。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如果制度在实现讲真话、守约、公平、团结方面创造出“无瑕疵的记录”，那么信任有可能增加。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并在“公民社群主义”（civic communitarian）策略中被作为范例的办法，它试图通过增加公民融入社团生活的机会来培养公民对陌生人给予信任的习惯和意向。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在第4章“信任、幸福与民主”中所作的研究，有助于阐明信任在维持现行民主政体中的作用。英格尔哈特运用1990-1991年及1995-1997年《世界价值观调查》中41个国家的资料，指出对特殊政治制度和精英的信任并不十分重要，至少对现行民主政体的长期稳定来说是如此。相反，稳定源于另外两个因素：主观幸福与人际信任。向民主的过渡很可能伴随着低水平的主观幸福和信任。但一旦处于适当的位置，为了其稳定，民主政权就需要：（1）一种足以支持政治反对派和权力转移的一般政治文化，以及（2）对现行政治制度扩散性的大众支持。这种文化最适宜于预期高水平的人际信任和主观幸福而不是信任政治制度和政治精英。英格尔哈特也不认为现行民主制度在促成人际信任方面起什么重要作用。他认为，这丝毫不令人吃惊，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政治生活只是他们生活中相当次要的部分，工作、家庭、住房、收入及朋友更为重要。然而，似乎为民主制度的稳定所必需的人际信任和主观幸福同经济发展和安全有着最密切的关联。这本书的其他一些作者（奥弗和帕特森）提出，有